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2.2

伊斯兰恐惧症

Catherine Delcroix

新伊斯兰民粹主义

Vedi R. Hadiz

谁该为全球气候变迁协商停滞不前负起责任？

Herbert Docena

辯論：不平等世界 中的社會學

Piotr Sztompka,
Tina Uys,
Nikita Pokrovsky,
Fernanda Beigel,
Helga Nowotny

- > 全球劳动如何可能？
- > 伊斯兰的草根公民社会
- > 车臣：和平何时才会到来？
- > LASA：关键宣言
- > ESA：骚乱社会中的社会学
- > ISRB：欢送Devorah, 欢迎Mohamm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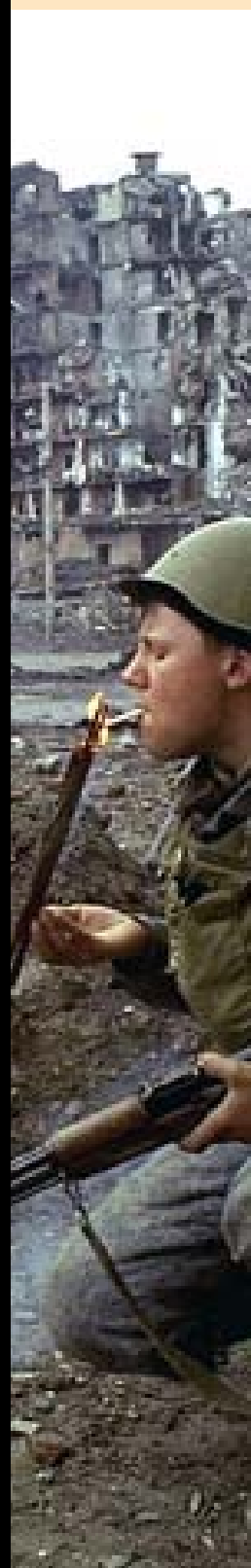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二期 / 2011.11

GDN



> 主编的话

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挑战既有的刻板印象和政治扭曲，特别是现今那些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不实描述。因此，这期的全球对话收录了Catherine Delcroix对于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之分析；Vedi Hadi也检视了伊斯兰新民粹主意如何在市场意识形态背后动员了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群众，以及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兴起模式。

Herbert Docena指出了市场和道德如何形塑了气候变迁的谈判过程、北方如何逃避自己的责任、以及南方怎么拒绝为这一切后果买单。在这里，市场以中立的仲裁者之姿进入，然而其破坏性却是昭然若揭。因此，Rob Lambert论证如何透过奠基在南方全球劳工团结主义去和新自由主义抗衡；Devorah Kalekin也纪录了去年夏天以色列的反紧缩社会运动。

市场基本教义派是以下两场演讲的重点：欧洲社会学会和拉美社会学会。他们不约而同地讨论在不平等世界中社会学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也是2014年在横滨的世界大会的主题。Piotr Sztompka则提出反对的观点，也带出了其他4篇的响应文章。这样的辩论或许不是新鲜事，不过在全球不平等的脉络下重新展现了其重要性。

这期的人权专栏讨论了俄国在车臣实施的恐怖政治。而历史专栏则感谢国际社会学会书评的主编Devorah Kalekin过去6年来的贡献。最后，我们要欢迎从波兰华沙来的新编辑团队，我们至今总共以12种语言发行。而从Bogotá来的团队则接手西班牙文的翻译工作。

全球对话可以在Facebook和ISA网站上阅读得到。任何意见与批评请寄给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 本期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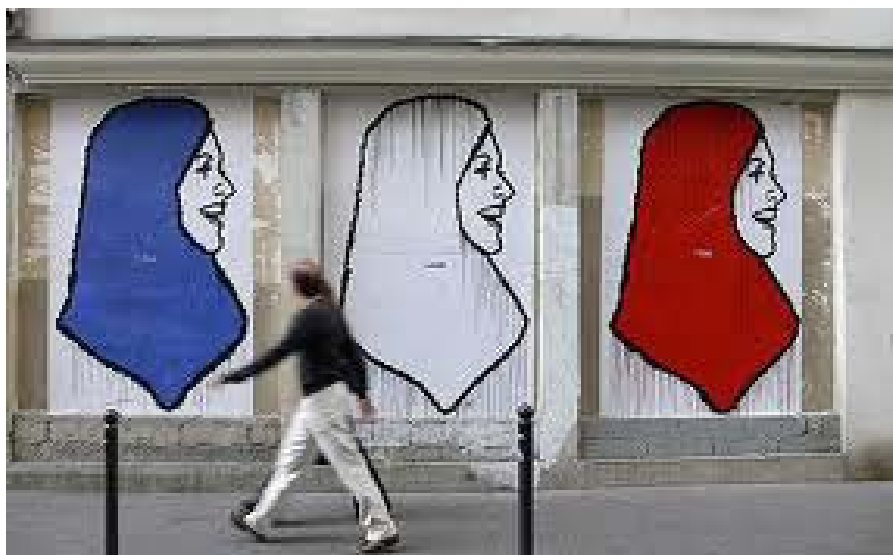
主编的话	2
> 伊斯兰	
论伊斯兰恐惧症：出走、发声、忠诚 by Catherine Delcroix, France	3
新伊斯兰民粹主义 by Vedi R. Hadiz, Australia	6
> 抗争	
谁要负责？气候变迁协商的风暴时刻 by Herbert Docena, Philippines	8
全球劳动如何可能 by Robert Lambert, Australia	10
自我探索：以色列的草根公民社会 by Devorah Kalekin-Fishman, Israel	12
> 辩论：不平等世界的社会学	
社会学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by Piotr Sztompka, Poland	14
卓越与平衡：让社会学变得更有意义 by Tina Uys, South Africa	16
“病人拒绝就医”或是“为社会学辩护”？ by Nikita Pokrovsky, Russia	18
学术依赖体系 by Fernanda Beigel, Argentina	19
不平等世界中的社会学 by Helga Nowotny, Austria	21
> 特集	
战争结束并不等于和平 by Alice Szczepanikova, Germany	23
拉美社会学大会：关键宣言 by Raquel Sosa Elízaga, Mexico	25
骚动年代的社会学： 欧洲社会学会演讲 by Anália Torres, Portugal	27
欢送Devorah，欢迎Mohammed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ennifer Platt, England	29

> 编辑委员

- 主编: Michael Burawoy. - 执行编辑: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e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 区域编辑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Colombia: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Zeinab Nesar, Fatemeh Khorasani,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Tara Asgari Laleh. 日本: 芝 真里, 塩谷芳也, 姫野宏辅, 高见具広, 速水奈名子, 岩馆豊, 池田和弘.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Anna Piekutow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Tomasz Piątek, Michał Chełmiński.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oiforova, Asja Voronkova. 西班牙: Gisela Redondo. 台湾: 何经懋. -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论伊斯兰恐惧症： 出走 发声 忠诚

by Catherine Delcroix,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法国



街头艺术：戴着头巾的法国女性

伊斯兰恐惧症 (Islamophobia) 已经出现在欧洲一段时间了。我最近在Brussels参加一个由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家所组成的工作坊，主题是欧洲的公民身份。一位欧盟议会中起草欧盟宪法的知名人士这样说道：“我们欧洲人是不可能接受伊斯兰的，因为这是一个暴力的宗教，对于欧洲的基督教认同会产生问题；伊斯兰移民唯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他们才有可能在欧洲长久住下来，成欧洲的一份子。”我们多数人听到后都惊呼不可思议！当有人问他说：“你认为你的观点和民主关心少数民族群的立场是兼容的吗？”他这样回答：“维护欧盟的秩序始终是首要任务！这远胜于少数民族群权利，甚至凌驾于民主之上。”

伊斯兰恐惧症由来已久。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是被用来剥夺当

地人民公民身份的理由。décret Crémieux (1870) 中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条件在于他们要彻底放弃伊斯兰信仰。当然，很少人这么做。下场就是丧失公民权利与自由，任殖民者宰制。

独立战争则改变了北非的游戏规则。像是在英国的印度人、孟加拉国人、巴基斯坦人，荷兰和比利时的印度尼西亚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法国

>>

的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突尼西亚人等，他们在一开始被定义为生产力或是移工，然后他们被允许可以带家眷过来，不过始终处于社会低阶层，现在则是被归类为少数民族。现在他们的子孙要求完整的公民权，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还得为去除加诸在他们宗教或血缘上的刻板印象奋斗。

面对如此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在欧洲的伊斯兰族群又如何回应？这问题不好回答，我想唯有这问题不好回答，我想唯有透过田野的方式才有可能。这20年来我深度访问了伊斯兰的移民家庭，特别把问题锁定在从Maghreb来的工人阶级家庭如何教育他们的小孩面对歧视。方法上我采取家庭史的重构立场，去访问家庭成员（包括父母与小孩）的生命史。另外我也在法国其他城市做了类似的研究。

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架构可以提供我们认识被歧视者如何去响应歧视。这里包括了1920年代的犹太人如何面对反犹主义，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族群。为了这个目标，我采取了Albert Hirschman的著名概念：出走、发声、忠诚。Albert Hirschman是一位经济学家，主要关心人们在面对国家官僚时的响应行动，例如像是面对没效率的国营铁路。他认为，所有的行动都可以被这三种类型所涵盖：出走、发声、忠诚。人们可能会继续搭铁路（忠诚），

或是抗议（发声），或是买车（出走）。

我们会发现这个类型学非常有解释力，特别是当我们应用在研究人民面对种族主义时的行动。他们可能会抗议（发声），这是1930年代相对少数的犹太人选择，也是少数穆斯林的行动方式；到今天仍多穆斯林数采取被动响应，希望有一天政府会让步，就像是法国与德国接纳犹太人一样；又或者干脆离开该国家（出走）。

>出走

让我们先从出走开始讨论起。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失业青年到Montreal去找工作机会。加拿大也始终接受有技术的移民。许多人有着类似的顿悟：“在法国我始终找不到工作，因为我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摩洛哥人。可是在加拿大，我被当成是法国人，然后就问我的技术！这有多么令人兴奋，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在法国，不管我有多么努力，到头来还是被问到你从哪里来，你是什么人，你信什么教。”

所以逃离这个种族主义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这些年轻法国人最终移民到澳洲或是阿拉伯国家。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移民，有些其他比较不那么令人开心的出走方式。因为种族主义会摧毁一个人，摧毁一个人的尊严、信心，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比较孤立或是内向的人。

最后他们可能染上毒品或是自杀。这也是另一种“出走”。

>发声

发声则是直接走向反对的一方。发声是直接反对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和歧视制度。这行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的。发声是一种要求被肯认的行动，像是在说：“喂！社会，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承认我！也同时承认我该有的权利，要实践你们所宣称的理念”

在法国有许多发声的例子，可能是以较为松散或是组织化的形式出现。像是2005年11月的banlieues 就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因为试图逃避警察而被射杀。相较于出走，发声抗议警察暴力，要求法国去实践“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们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是反社会分子。反而比较像是他们仍愿意相信这个社会有自我改革的能力。

发声是三个行动类型中最有可能从个人层次演变成集体层次的行动：从微观到地方、区域、甚至是国家的层次。但这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秩序总是会反扑。虽然不会总是以镇压的形式出现，不过最常见的方式是用论述去扭曲他们的行动与动机。

让我以穆斯林头巾为例。试想，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要带头巾呢？是屈从于基本教义派的压力吗？许多访问会发现，事实

很出人意料，因为年轻的女孩带头斤是自愿的，并且和父母的要求其实背道而驰。起初很多人不相信，但后来发现这的确是事实。这些女孩也说这么做一点也不会让他们自己觉得不是法国人。

对头巾现象最好的诠释是Houria Boutelja，指出第二代年轻穆斯林女性的矛盾处境。一方面，歧视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确实存在，也存在伊斯兰恐惧症，也在劳动市场上存在歧视。不过对于女性来说，穆斯林男性更容易受到这种不平等制度的伤害。“离开你自己的家乡，逃离自己的父亲与兄弟，不要回首过去，加入这个开放个法国社会。”

Houria Boutelja认为这对穆斯林女性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一种自由的诱惑。她们带头斤其实是一种沉默的发声：

“不，我们不会背叛自己的家庭和社群，你们已经歧视他们很久了，一开始是移工，后来是穆斯林。我们会永远站在他们那边！”

但另外一方面，头巾也对她们所属的家庭和社群发出讯息：“看看，我们没有背叛你，对不对？所以，也让我们自由吧，我们不会迷失方向。我们想要继续念书，不想嫁给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男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生！”这不是对法国社会的忠诚，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发声。

>忠诚

那么，忠诚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要对一个排挤自己的社会表达出忠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态度对于第一代的移民来说却是相当常见的。所以一项由Claudine Attias-Donfut所做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有90%的人认为法国就是自己的家。

另外，我也发现有许多父母会教育小孩子在面对歧视的时候不要以报复的方式去响应。这是一种教育小孩要有耐心的方式，以期待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而第二代的年轻人则对于忠诚的理解比较不同：他们认同法国的价值观，而且认为自己是欧洲公民。他们因为有家在欧洲，所以会有归属感，并且相信法国会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归属或不归属，这是一个问题，但确有两种表现。伊斯兰恐惧症是承认的反面，而承认是构成归属的必要条件。让我用Floya Anthias的话来做结语：“归属感包括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经验，不只是身份、权利、义务而已，也不只是群体的认同；归属感还包括了被身份和认同所结构的社会空间，以及相继而来的感觉与情绪：是否属于更大的一个群体，是否被接纳。”

这是问题的核心。我相信社会学家有能力藉由杰出的方法，收集个案、呈献行动者的生命史，去

改变欧洲主流的价值观，让穆斯林不再成为大众的代罪羔羊，也让他们更属于我们。

References

- Anthias, F. (2002) "Thinking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national Positionality," www.imstr.dcu.ie [4:1].
- Attias-Donfut, C. (2006) *L'enracinement. Enquête sur le vieillissement des immigrés en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 Boutelja, H. (2006) "On vous a tant aimés." Entretien réalisé par Christelle Hamel et Christine Delphy. *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 25(1).
- Delcroix, C. (2009) "Muslim Families in France: Creative Parenting,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Oral History* 37(2).
- Hirschman, A. (1972)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新伊斯兰 民粹主义

by Vedi R. Hadiz, Murdoch University, 澳洲



Recep Tayyip Erdogan: 土耳其总理，为伊斯兰和新自由主义诉诸群众支持

我们在最近的阿拉伯世界之社运事件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传统的伊斯兰反对运动并不是这一系列运动中的主角。这很有趣，因为自从冷战以来左派在伊斯兰世界销声匿迹之后，伊斯兰组织就成为反对威权政府主要资源，在北非和中东特别是如此。例如，在埃及或是突尼西亚，An Nahda和Muslim Brotherhood两个组织在后威权时代里表现得很好，这无疑地就是对西方媒体向来夸张的恐惧伊斯兰言论提出警语。

更进一步，我们会发

现伊斯兰的政治已经转变为一种所谓的新伊斯兰民粹主义。若是传统的政治型式是优先以都市小资产阶级、制造商、或是农村菁英的利益为考虑的话，那么，新伊斯兰主义则是由多个不同的部分所构成的：被边缘化的资产阶级、有企图心且受过良好教育但却仍然位于社会低阶层的都市中产阶级、以及人口暴增的都市贫穷族群（例如在Cairo, Istanbul, Jakarta）。这些人努力追求好的教育机会、工作、以及更好的生活。在这个脉络下，unmah一

词取代了people（人民）。这个字有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它是一种美德的代表；第二它包含了所有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

上述的转变对于伊斯兰组织（像是Muslim Brotherhood，虽然在国际间并非铁板一块，但是在埃及它还是相当有势力）的影响相当深远。事实上，新伊斯兰民粹主义的例子早在2002年土耳其的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身上就可以看到。埃及的Egyptian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也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他们都是Muslim Brotherhood的新政治代表组织。即使在南亚，印度的Indonesia's Justice and Prosperity Party (PKS) 也是很成功的伊斯兰政党，他们已经从AKP那边学到很多成功的经验，因为AKP第三次在普选中胜出，让主流大众心服口服。除了拥抱民主之外，AKP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传统伊斯兰主义做出明显的区隔。

AKP的成功并不能被视为是民主参与度提升所导致。很重要的一点是unmah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经济位置的目标不一定是伊斯兰政府或是由伊斯兰教所统治的国家。目标可以是unmah或是相关的政党组织重回社会经济的主流位置。

尽管那些都市贫穷族群的草根支持和领导都是来自于那些有野心的都市中产阶级，AKP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Anatolian资产阶级。这些人主要是伊斯兰商人，长期以来被Kemalist世俗官僚和政治所排除在外，因为Kemalist是支持Istanbul的大资产阶级。很重要的是，以乡村为基础的Anatolian资产阶级正在快速茁壮之中，且自从土耳其从80年代起就转变为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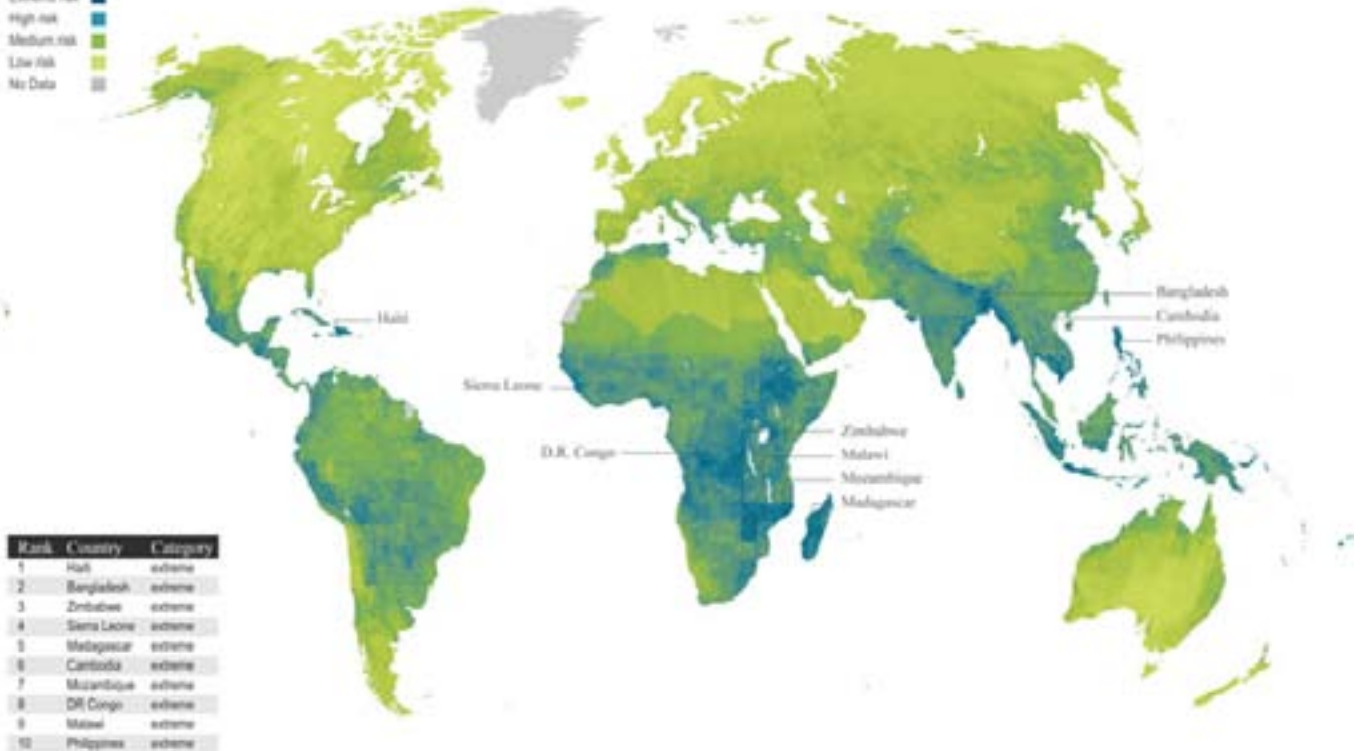
导向的全球化市场国家后，这一现象特别明显。然而在土耳其，宪法仍不允许挑战国家的力量出现，所以即使AKP已经拥有很多的支持者和庞大的网络，他们仍不可以公开地被视为是伊斯兰政党。不过这些似乎并不成为AKP成功的阻碍，因为他们已经一步步取得政治权力，并提升unmah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下的unmah意味着他们比起世俗的菁英更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劣势地位。

但是在埃及，由于情势变化多端，我们很难断言Muslim Brotherhood一定会成功。事实上他们的重要性已经不高了，所以在埃及革命时他们并非主角。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Muslim Brotherhood在Hasan Al Banna或Sayyid Qutb时代就有所不同了。在这里，重要的是那些年轻中产阶级、都市穷人、以及散落的左翼或自由派组织所汇聚而成的力量。此外，Muslim Brotherhood主要是由商人所组成，并且早期企图掌控政治，但后来被Mubarak放逐。总之，Muslim Brotherhood是民主为一项可以掌握Mubarak亲信的工具，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至高点。

然而，新伊斯兰主义也并非总是成功的。若在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是PKS，那很显然地他们的政治势力还是微不足道。这很耐人寻味，因为他们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伊斯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内的华人势力仍位居主导地位。

不论成功与否，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带给我们一项启示：他挑战了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伊斯兰政治的刻板印象。

Extreme risk
High risk
Medium risk
Low risk
No Data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浅绿色代表最不脆弱的地区；深蓝色代表最脆弱。北方国家排放了最多的二氧化碳，但却受害最少；南方国家排放得少，但却受害最严重。Courtesy of Maplecroft

> 谁要负责？ 气候变化协商的风暴时刻

by Herbert Docena,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Mani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今年12月，上千位的官员、运动者、说客、以及几位大明星将会到Durban参加第1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UNFCCC)。明年6月，Rio又会举办UNFCCC和其他环境协议第20年的会议。20年过去了，许多人都同意这是有史以来是最复杂、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多边协商会议，不过我们该问的是：迄今我们达成了什么目标？

当我正在写这篇文张的时候，在菲律宾的Bulacan有

上百人因为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家园，所以只好待在屋顶等待救援，或是挨饿受苦。他们焦急地等待，因为上千人的城镇只有两艘救生艇负责救援任务。这一天刚好是他们决定停止纪念史上最强台风的后一天，也正好是另一个台风来袭的前一天。

许多国家在20年前开始决定减少碳排放量。然而暴风却越来越多，灾情越来越严重，一切都被科学家所料中。一份去年5月由国际能源

署的科学家所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去年的碳排放量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被众人所批评的、哲学家Peter Singer所称的“新奇的杀戮方式”的碳排放量，真的逐年在升高吗？

去年6月我到Bonn去观察气候协商会议，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辩论的主轴：新版本的“承诺与评议”。这项计划最后决定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他们要怎么行动。没错，你看不到任何确切的目标

>>

，也没有任何承诺。在另一个地方：Bolivia要求征收全球税，用来资助对抗气候变迁的计划。我冷不防地像是回到90年代一样，在类似的会议刚开始兴起之初，许多计划被搬上台面讨论，然后最后不了了之。现在相同的计划又都回到谈判桌上了，我到Bonn的部份原因是因为想要知道谈判协商的发展，最后发现一切又都回到原点。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访问了参与密集会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位人士，以及我也阅读百多页的文件之后，发现两大集团——北方与南方——彼此都没有达成一个满意的共识，所以还是围绕在那个最基本的老问题上：该由谁负责？

的确，在这古老辩论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这个谈判僵局是因为一个我们最世俗道德的问题：从最开始，许多的发展国家，包括最工业化的到最贫穷的，都控诉北方应该为气候变迁感到自责，因为这些北方国家排放了最多的二氧化碳。多数的已开发欧美国家则齐声拒绝这项控诉。

美国的协商立场这几年一直在变，然而主要谈判者Todd Stern的意见：“我们的确承认美国一直在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但是关于究责或是赔偿的部份，我一点也不同意。”我相信，这会是所有包括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的决策者、相信气候变迁或不相信气候变迁的人士、说客或是环保人士、等等，都会同意的意见。美国的谈判者从来没有输过，而我的访谈经验发现，他们总是会重复这样的一句陈腔滥调：我们不会为那个虽然造成伤害——可是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负上任何的责任。

很显然地，各方长期以来就同意依照他们“共同但是有差异的责任以及不同的

能力”为这件事情作出贡献。可是，这样的说法变成是谈判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观点：南方谈判者会把“差异”这个字视为是北方历史责任的基础。北方诸国则是把重点放在“共同”这个字上，这和南方国家总是提到“共同但是有差异的责任”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一旦强调共同，就可以继续加上“各自的能力”的宣称。意思就是说：可以，我们会采取行动，但这一切视我们的能力而定，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义务。

这不仅仅是语意学上的诡辩而已，因为每一方对于责任的立场其实间接就是其针对以下问题的答案：谁该负责？谁该做什么？谁拥有什么？

南方国家坚称他们是受害者，因此他们在决策过程积极发言，希望可用惩罚性和强制性的方法，并要求北方做出赔偿，像是针对超标排放量的全球税或是罚金。北方则拒绝这些指控，并坚持若他们愿意作些什么，完全只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么作，而非他们应该这么作。此外，北方国家也要求决策更有弹性，更符合成本效益，并且要透过自愿而非强制性的机制，甚至是奖励制度。所以这也侍卫什么他们会提出像是“承诺与评议”或是二氧化碳交易等的主张。

北方有效地把谈判者限制在那些主要的排放国家，而非全部的193国，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合理的（像是Berkeley经济系教授Brad DeLong就发言认为，许多旧金山的人根本不会管洛杉矶的天气是怎样），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那些具有领导资格的人才有权决定。但是这对于关心正义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加害者从来就不被允许可以对惩罚置喙。

至于要求奖励，而非惩

罚——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那些自认强权的国家所提出的，可是在那些认为北方国家该负起责任的国家眼里，是很荒谬的。罪犯怎么可以要求在惩罚中得到任何好处呢？同样地，北方拒绝以民主的方式运用基金（因为南方国家很难让人信任）对于那些视自己是大慈善家的国家来说是很正常合理的，可是对于南方来说同样地是荒谬至极。

即使在重要性日渐下降的气候外交领域，罪责或是无辜这类的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答案就是一种对于社会关系的定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特别是如此。20年来北访和南方为这些名词争论不休，像是什么样的要求才是合理的、怎么要求别人才合理、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等等。

北方诸国迄今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无辜的形象制度化了（在一些南方国家的支持下），透过京都议定书的保证“弹性”，和碳交易，一种赢过南方早期所提出的强制性惩罚方案已经被确立下来了。

但是，这不表示问题就此结束。就像不断还是有要求赔偿、全球气候裁决、气候正义的声音出现，只要问题没有被完美的解决，协商谈判还是会继续原地不动20年。这对那些在Berkeley山丘上悠游自在的人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等于在Bulacan那些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难民。

> 全球劳动如何可能？

by Robert Lambert,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前ISA劳动研究委员会会长



澳洲和委内瑞拉的抗议网络：2008年5月在Caracas的研究。

即便在那最黑暗的年代理，我们仍然拥有期待光明的权利。我们很少从既有的理论和观念中得到这个光明的力量，而是往往从不确定与动荡之中发现一丝幽微曙光，并点燃人们生命的希望，照亮整个时代。

—— Hannah Arendt, 黑暗时代群像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重危机的年代里(气候、金融、工作)，Edward Webster、Pun Ngai、Enrique de la Garza (Global Dialogue, 1.5, July 2011)等人的讨论围绕在一个重要的议题上，那就是：我们有可能抵挡住来自全球资本家、金融、制度、和国家的力量，进而想出解决眼前这个迫近的人类危机吗？全球劳动有可能扮演起动员社会的角色，去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金融体系，规范全球资本，进而重新建立一个更正义的社会？全球劳工运动有可能挑战新自由主义吗？

上述三人都对这些眼前

的困境和议题做出了贡献。Webster从他毕生对南非劳动的研究中发展出“团结”的概念，这概念在某些环境中或许分裂了，但依然强韧，仍有培力的潜能。若是在地方的层次上要转变个人主义是一项挑战，那么在全球的层次上会更困难到什么程度呢？Webster认为，后者或许可以从3种团结的概念上来思考展开：人权(为弱势辩护)、生产(连结劳动场所)、规范(制定保护权利的法律)。

潘毅以一个很精炼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世界的工厂。并指出这是新工人阶级的全球梦魇。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却无法在城市里生活，所以是“半个工

人”。这些在城市里的“流浪者”遍布中国，改变了都市地景。最后，她提及了这样的暧昧身份和剥削制度如何导致集体反抗的增加。

Enrique de la Garza以拉美得经验响应Webster，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可能会带来劳工运动的全球连结。这样的连结可以透过新的工人认同、剥削、非典型雇用等来理解。因为这样的劳动状况在南美洲占了40%到70%。至于新劳工运动的前景，他问道：新的连结将会反对新自由主义，深化其角色和重新点燃乌托邦社会的想象吗？

然而，上述这些概念还是只停留在纯理论的层次上

，缺乏对于世界劳动不平等发展的具体分析，像是对能动性、政治、运动或是行动的评估。所以我在这篇简短的回复文章中仅提出简单的问题，希望超越学院缓慢的步伐，进而建构Webster的团结概念。

>能动性

这里我们必须对旧的劳动世界主义和新的劳动世界主义做出区别。前者主要是官僚体系，后者则是以抗争为导向的运动者。唯有运动者才能带来改变，解放人类，即使代价很大。相较之下，对于一些人来说，全球劳动不过代表着工作机会、职业、或是中产阶级的依靠。当全球南方继续产生许多运动者的时候，在北方那些不满金融危机的人们同样可以产生类似的运动者。葛兰西所谓的“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挑战了学院，要其和这股力量一起动起来。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学院和运动之间来回穿梭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过度聚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掠夺和霸占呢？我们又对于摧毁这个纯粹的市场逻辑有多么地坚定呢？想想我么有多少选择，其实提供了我们对于能动性有更多的想象，进而作为一股批判的能量，改变政治现状。

>政治

尽管有些明显例外的例子，在北方的全球劳动制度化(国际劳动组织)是被政治和经济分离所决定的，至少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去挑战其破坏性的本质。这是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全球劳工运动，认为劳动权利可以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本。对这些全球劳动制度来说，即使

这样的策略再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可是行动和游说政治精英还是同等重要的。

在某个程度上，或许有些矛盾，但我还是希望政治重回全球南方，并奠基在各国的劳动运动上，像是巴西的CUT、阿根廷的CTA、南非的COSATU、印度的CITU和韩国的KCTU。上述组织再过去20多年间都累积了丰富的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经验。因为这些力量透过SIGTUR (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而团结起来，已经让大家知道我们要为何而战，而不仅仅是要反对某个特地对象而已。SIGTUR才在初始阶段，正在辩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具体替代方案，不论短程、中程、长程都有其必要。这些其实都源自于马克思的理论，他关于资本积累、剥削等的看法，另外加上Polanyi对于市场、社会、商品的分析。若全球劳动在南方可以形成新的政治气候的话，这将会对正在经历危机的北方带来莫大的鼓舞。社运和新政治是这个转向的基础。

>迈向新全球化运动(新的团结)?

David Harvey提出了一种新社会运动的概念，认为其是由异议者、被剥削者、异化者所组成的。这是个很有去的观点。在全球劳工会(Global Union; UNI)于7月在巴黎的国际大会上，法国总工会(French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CGT)惋惜地说到全球劳工运动无法结合西班牙的年轻indignados和希腊的 aganak-

tismenoi (outraged)，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年轻运动者，因为如此追求民主的运动必须延续下去，并且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契机其实就在那边了，但是劳工运动并没能掌握到。制度化的全球劳工运动总是在五星级饭店里面开会，看起来并不想要发起任何社会运动。所以可见内部并没有协调好，而我希望南方可以扮演起关键的角色。

>全球集体行动

精英游说的劳工政治必须先让路给长期的激进行动，并且挑战全球经济(运送)和全球生产网络的逻辑。在1990年代，SIGTUR组织了许多成功的货物运送的杯葛行动。在韩国，有一位工运领袖因为企图使货车变慢、瘫痪交通，而进出监狱了好几次。这些有纪律、集体、有组织的行动展现了全球劳动的潜力。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的想象和政治意志将会对上述这些领域产生影响吗？公共社会学家在此战役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要产生新想法，加强新的政治、运动、以及行动，所以是运动力量的希望。资本家或许会、或许不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坐享成果，不过我们会知道总会有人走上街头而非进住饭店里面，这么一来，就像Hannah Arendt对于20世纪黑暗年代的思索，他们或许会提供21世纪光明的前途。■

> 自我探索： 以色列的草根公民社

by Devorah Kalekin-Fishman, University of Haifa, 以色列, 前ISA出版副会长、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编辑



夏天，抗议市场化的运动

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正值以色列的夏季，而持续两个月的示威活动惊动了以色列向来自满的右翼执政联盟，这些人总共占以色列国会人数的3分之2。

这年夏天，以色列的人民彼此敞开心

房，承认要好好和睦相处一如此简单的要求一却是如此困难达成。他们发现，同志情谊仅仅在军队里面才看得见。直到9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鼓励示威者的活动，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以色列的确是一个民主国家呢

>>

！街头上不论是男人或女人、阿拉伯或犹太人、中产阶级或是下层阶级，他们的诉求都是希望有一个公平的重分配机制以及政治改革。抗议活动包括了来自各个年龄的公民，而到了第4天，9月3日，人数总共有43万之多，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总人口的7%，超过30万人来自Tel Aviv、5万人是来Haifa的阿拉伯或犹太人、数以千计各城市的居民、以及约数百人来自于阿拉伯村落。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表明拒绝为任何政党站台或背书，也因此参与人数可以始终维持那么多人。此外，他们也组成了学术委员会，向政府发要求更广泛的工作机会、更适宜的居住环境、以及健康与教育政策。政府也组成委员会去研究在既有的预算限制下执行这些政策的可能性。在抗议的高峰期过后，活动开启了千人的圆桌论坛，共同研究、分析问题，试图跟政府提出解决方案。抗议活动期间如此强大的运动能量，最后转变为持续不懈的草根运动。

而随着High Holy Days的接近，政府决定净空街头。大家也开始注意到了那些住在帐篷的抗议人士；中产阶级抗议者则转进由那些真正的无壳蜗牛(符合资格去申请公共住宅的人)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帐篷在还没成为抗议活动的过夜方式之前，已经是取代住在走道、一家人挤在一起的一种很好得替代方案了。

无壳蜗牛的困境完全是因为过去30年来右翼政府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1977年起，政府就有系统地删减福利制度、实施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执政联盟不断以安全考虑作为威胁，宣传

只有纪律和服从才是追求国家整体福祉的唯一道路的意识形态。由非政府组织向来不断争取的人权议题始终被忽视，除非只有在法院的补偿案例或是在还没被右翼政府废除之前，才有可能被看见。

由数百个团体集结而形成的公民社会的确会让人大吃一惊。这一切都由一位叫做Itzik的人所开始的。他发现，以色列重要的民生必需品：奶酪，其价格居然远远贵于欧美，因此在脸上号召消费者抗议，也成为了后来这个中产阶级社运的预演。抗议者从7月开始，这时也是Dafna Leef开始进驻帐篷的时候，她是因为付不起租金而抗议，于是后来陆续有数百人开始响应。

Kiturim是一种和朋友在家里聊天饮食的休闲活动，是传统星期五犹太人的活动，突然就成为了了生活的基本权利。这个发展让人想起了以色列集体农场的参与民主形式：城镇会议。就像在波兰或墨西哥的公民社会组织者一样，以色列的运动试图藉由让人民发声，进而影响掌权者。少数人则是坚持要革命。同时，政府发言人则说人民的声音已经被注意到了，政府会做出回应。可是现在距离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政府向来会为了赢得选举而有一些暂时性的作为，要期待他们真的可以做出改革，恐怕还是缘木求鱼。

> 社会学 在这个不平等的 世界中应该扮演 什么角色？

by Piotr Sztompka, University of Krakow, 波兰, 前ISA会长

约莫10年前，2002年在Brisbane举行的ISA世界大会上，我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诉求赢得了会长的选举，那就是“追求卓越而非平衡”（Excellence rather than balance）。而现在这个口号则是相当贴切。为什么？因为在2010年于Gothenburg举办的世界大会上，Michael Burawoy以压倒性的胜利当选会长，并把革命的热情注入了ISA；他诉求另类、在地的社会学，并指出西方学界在方法与理论上的压迫本质，以及所谓的英语帝国主义。我们并不同意，论点已经刊登在Contemporary Sociology (July 2011, pp.388-404)。不过，这篇文章似乎也造成了不少误会，我也被莫名地贴上“最后的

实证主义者”、或是“美国的盲从信徒”等标签。因此在这我想要再次重申我的论点，以尽可能清楚的方式，归纳为10点论纲。Michael也慷慨地让我在全球对话中有发言的机会，这真的要谢谢他。

第一：我们不应该从真实世界中、或是世界各地社会学得不同处境中，得出任何认识论的结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能发觉到不管是社会之间或是之中，是存在着不正义且不平等现象的。可是不代表我们对应该要有两种社会学(弱势和非弱势)。真正好的社会学是可以同时被用来理解穷人和富人的。

第二：让我把一个著名的格言颠倒一下：在改变这

个社会之前，重点是要先理解这个社会。还是一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都是支持改革的，可是这不代表我们的志向就要被道德化、布道、或是意识形态宣言的方式去理解。恰好相反，唯有在发现了社会运作规律的机制之后，特别是那些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机制，我们的改革行动才得以可能。马克思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街头。而且他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从来就不是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资本论。

第三：世界上有很多社会，但社会学只有一个。虽然世界各地的样貌会因为文明、文化、社会而有不同，但是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机制是对所有人类的族

群都具有普遍的解释力的。而且因为全球化，除了不平等之外(北方vs南方、核心vs边缘、种族、性别、阶级等)，其他现象都渐渐趋同了。

第四：对于好的社会学研究的标准是普遍有效的。这包括了不断被发明了方法、工具，以及多元的理论。这和实证主义没什么关系，因为像是主流的质化方法，即使是宣称要找到社会中的特殊性，或是其标准和所谓的实证主义并不一样，但是判断何谓好坏的标准也是普遍性的。

第五：原罪不会让结果失真。即使方法和理论都是从很久以前就被西方世界，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多数是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可是无损于理论本身的价值。理论本来就要被不断地质疑、修正、以及改进。因为这样是帝国主义而拒绝这些理论的行为，其实是反智的蒙昧主义。我建议，我们应该要和牛顿或默顿“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六：任何想要创造另类、在地的社会学得努力，不但徒劳，而且危险。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永远不知道疆界在哪里的。科学像是一个知识的公共领域，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家都会被欢迎对此做出贡献。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研究机会、计划、问题，但这些并不需要其他特殊的方法或理论。不同于诉诸在地社会学，我是建议，先做就对了。有许多重要的社

会学作品就是在非西方的国家里写出来的。重要的是这些理论都是有标准的方法，且对一般化的理论有所贡献。我们看不到什么替代性或是在地的理论，可是这些作品都极具水平。

第七：在现今全球化的世界中，那些想要建立国家/民族社会学的呼吁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不同的国家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社会学就应该也不相同。国家/民族在此的意义是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代表性人物、以及研究重点。一旦这些研究想要被称为社会学，那么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对普遍化的理论有所贡献。未来，包括ISA本身，国家社会学的角色将会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社群或网络(像是RCs, TGs, or WGs)。

第八：不论在各个领域，英语、而非人造的语言像是Esperanto，变成了最多人使用的语言，这个事实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个契机。特别对于那些非英语的社会学家可以接受到世界社会学得影响(透过翻译)，或是可以增加能见度，对一般化理论有所贡献(透过在英语期刊发表)。

第九：我们并不相信：研究者的处境状态可以提供我们认识论上的益处。揭露不平等的规则与机制不是局内人所独享的功劳。科学的正当性唯一来源是科学本身结果的好坏，而不是研究者的社会位置。

第十：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见很难避免，甚至是在选择问题、决定主题的阶段，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在结论和呈现数据的时候，要绝对避免。像是Gunnar Myrdal建议的：所有的价值都应该开诚布公拿出来辩论，这也是我要写这10个论点的理由。 ■

> 卓越与平衡： 让社会学变得更 有意义

by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 国家学会副会长

ISA于2009年台湾举办国家会员会议，之后将论文集发表，总共3册。Piotr Sztompka在为此写了一篇书评，之后在这期全球对话又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他的评论发表在Contemporary Sociology上，该次会议的筹办人、同时也是当时国家学会副会长的Michael Burawoy也写了一篇响应。会议主题是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而下一次2014年在日本横滨的世界大会也将采用这个主题。

我的意见正好和

Sztompka相反，我并不认为这三册书具有什么革命的热情，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企图的展现：企图加深我们对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核心与边缘交换之不平等现象的认识。

而或许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来为ISA和国家会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历史性的脚注。当ISA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于1948年成立时，会员资格就限定在国家会员，所以本质上ISA的会员制度是集体会员制。在1970年时首次引进个人会员制度，扩大了国际的参与程度，也拓深了研究委

员会机制的发展；不过同时也削弱了国家学会在决策机制时的重要性。所以后来在ISA于1974-78年设立副会长职务时(研究、计划、会员与财务)，国家学会很诡异的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在1994年于Bielefeld举行的世界大会上，主要决策主体从国家学会委员会独当一面，被替换成由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共同决策。

从ISA创立以来，会长都一直由是欧洲(10人)和美国(5人)垄断的局面，唯一的例外是巴西的Fernando Cardoso (1982-1986)和印度

的T.K. Oommen from (1990-1994)。而这期(2010-2014)各个研究委员会的会长也都是——一面倒地来自全球北方。Sztompka对此可能会认为是卓越胜于平衡。Raewyn Connell则会认为，这种由北方生产理论、南方收集经验证据的全球分工，正是社会科学“核心宰制”与“边缘附庸”的体现。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像是北方所生产出的知识向来就比较容易传播出去，因为研究所的集中、或是语言的易取得性。

ISA的规章中载明：本组织的目标是不论学派、方法、意识形态、意见的差异，要代表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并增进社会学知识的了解。在这点上，其和Sztompka所谓的“多元社会的单一社会学”与“标准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概念有所抵触。在特殊脉络下所生产出的理解并不能被预设成具有普世的适用性，特别是若这个脉络所指涉正是全球北方的时候。

长期以来ISA就一直积极地去实现其目标。一个很好得例

子是：之前的会长Immanuel Wallerstein就在1998年第14届世界大会之前举办了10个地方性会议，聚焦从区域的观点去讨论全球社会学的情况。而在平衡ISA决策机制结构这点上，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是印度的Sujata Patel被选为2002年国家学会副会长。这也改变了规章，让国家学会和研究委员会一样，在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大会之间要举办一次国家学会大会。第一次是2005年在美国的Miami，会议成果发表在由Sujata Patel (2010)所编的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上。

理论和方法会各自有百家争鸣的情况，而世界观(可能来自同一个理论或方法)也是如此。有些时候是原住民社会学、性别理论、人道自由主义。原住民社会学可以意味着一个国家内的地方脉络，或是跨国的区域(如全球南方)，或是你怎么从你的身份位置上去观看事物(立场理论)，像是性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社会学得挑

战将会是如何在同一个屋檐(社会学和ISA)下去容纳这些差异，因为若人们觉得他们的声音不再被听见，他们就会出走。所以，所谓的“一个科学”有可能容纳得下那么多的差异、并且可以让他们的声音都被听见吗？

下一届的国家学会会议将在2013年举办，也将是一个提供这种包容性空间的好机会。我们会尽可能的让讨论和辩论更贴近真实，针对对世界上各国和各个区域社会学真正有关得主题和方法。如此我可以保证我们会同时拥有卓越和平衡，生产对全球和地方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学知识。■

> “病人拒绝就医” 或是 “为社会学辩护”？

by Nikita Pokrovsky, State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ists, 俄国、执行委员

在我数十年致力于专业社会学和国际社会学之后，深深感觉到社会学的未来充满危机。社会学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专业性也变得脆弱。我会把我这部份的感觉和直觉以理性分析的方式表达在这篇文章中。我时常问自己下列这些问题“我们真的需要为社会学辩护吗？”、“敌人在哪？”、“为何是现在？”，以及其与我的国家俄国或是世界有关的面相。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是现在的我不得不认为，社会学同时面临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威胁。

>外部的威胁

所谓的外部威胁主要只有一个。直接说来，就是当今的社会学正快速地失去其影响力和威信。不论是掌权者(国家或企业)或是大众都不再对社会学的理性分析感到兴趣。反而倒是各种非理性的论述大行其道。这些旧的或新的思维来自宗教、神话、意识形态、盲从等，而且普遍存在于社会中。这些力量毫不费力地把理性抛在一旁，这个现象甚至发生在社会科学里面。如此以来，理性与专业的社会学就逐渐式微了。在我看来，社会学的力量和能力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社会

学家可以为社会做出诊断；然而渐渐地我们却看到我们的病人或客户(即社会)并不买社会学家的帐，不愿就医。我们的社会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尽管事实上已经久病缠身了。总之，社会学的外部威胁是来自于社会拒绝社会学得科学理性分析，我称此现象为“病人拒绝就医”。

>内部的威胁

有来自外部的危险，那有了内部的威胁也就不稀奇了。因为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社群察觉到他们所扮演的公共社会角色正逐渐褪色，所以决定要把社会学转变成一股社会力量，像是社会运动一般想要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观点下的社会学，学术志业变成只是背景，而社会的公共服务才是重点。“社会学只是诠释这个世界；但重点在于改变”。这句改自马克思的名言正是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社会学家的座右铭。对这样的社会学来说，行动先于知识。我们同意这样看法吗？我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从1917年之后的俄国史中，我们很清楚了解到什么叫做实践先于理解。

>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我相信社会学家的位置不是在穿着科学的白袍时却去在意公共政治的障碍。的确，社会学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为公共理念而成为斗士，可是这将会剥夺掉社会学作为科学的代表权。我们不应该预设社会学家非得要去治疗(和诊断不同)社会。我们有很多其他机构制度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像是国家、政府、组织、社运、媒体、公共意见等。任何对于临床过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诊断的重要性，而且治疗完全依赖于诊断的精确性和正确性。诊断不可以和治疗混在一起，这两者属于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没错，我们是应该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贡献些什么，不过是要建立在客观的专业知识上，透过教育和媒体，去让社会更认识什么是社会学，这正式社会学的公共任务。我们不应该让盲从领导盲从。

所以我非常支持Piotr Sztompka为社会学所提出的辩护。社会学对于我和我来说都是要首先致力于专业的杰出成就上，而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 学术 依赖体系

by **Fernanda Beigel,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Mendoza, 阿根廷**

Piotr Sztompka不但把“社会学的社会学”当做虚假意识形态，还在社会学内部建立了一种学术依赖体系，知识帝国主义，以及知识殖民主义。这样的依赖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被毫不批判地被混合在一起，被自然化和强迫丢弃(2011: 389)。除了Sztompka在描述边陲学者时不尊敬的语言，我想说的是，科学的批判研究有很长期的历史，20世纪在北方都有出现了，那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是在冷战期孕育的。现今学术依赖体系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并且对于Sztompka (2010: 22)来说就是当代社会学的典范：“多元实用主义学科”。作为研究领域，学术依赖体系这个概念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批判知识论、以及高等教育的比较分析中而来。它包括了不平等的知识生产及流通方式，并且从全球知识系统的历史中而来。这个结构涵盖了制度、物质、象征

的过程，这些过程彼此相互关联，并且建立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路径。在边陲国家，它的形成是民族或是地区对于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响应，特别是当国家在科学发展和高等教育中扮演多重的角色时，更是如此。

对于科学发展和国外援助之间的关系、出版和稀少资源、学科之间学术声望的不平等，不同知识的能力和学术流动，等等主题的研究，其实不少。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知识的依赖关系，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知识殖民主义。此外这些研究也批判地结合了依赖分析和拉美结构主义一两种关心政经关系的领域。1970年代后半，先驱者如Edward Shils, Joseph Ben David和Philip Altbach找出了某些特定的因素使得学术场域的宰制成为可能。在1988年，Frederick Gareau在International Sociology发表了一篇重

要的文章，说明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如何只少少地参考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个案便建构了普世性的真理，这不免令人怀疑这种真理的客观性。他在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里面指出98.1%的作者都来自与北美或欧洲国家，这里所谓的欧洲大多数还是英国、法国、德国的作者而已。

最近的研究则指出，所谓的社会学得“普世标准”或是“好的理论”是被国际间的出版体系所建构和合理化的，这这个系统不过就是1950年代Eugene Garfield所开始的。几十年下来，社会科学引用索引(SSCI)已经被美国和欧洲的期刊所垄断。学术声望过度集中，而且学术阶层体系俨然定型。边陲国家的知识在核心国家里面完成并出版。在拉美、亚洲、欧洲，尽管科学研究的量有所增加，但是SSCI总量还是不到20% (Beigel, 2011)

，学术自主性的建立变成了复杂又困难的一种游戏，美国或法国的社会学从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一切本来就是那么理所当然。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UNESCO, 2010)指出，那些制度环境、翻译能力、以及物质资源的不等对于学术界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合作型的研究始终还是集中在北方，只有极少数是南方来的(2010: 146)。Heilbron也曾经说过，核心国学术界的象征资源以及英文写作的流通能力无远弗界，其他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差可比拟。后面这些语言的“外销”能力很差，几乎算是没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对于那些核心的期刊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对话。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边陲国家自己的学术产量会集中、增加，可是却没什么机会与核心接轨。特别是那些属于边陲中的核心国家，其实已经是南方区域的领导者了，可是要称为“全球社会学”，仍然差一大截(Beigel, 2010)。

至于对于克服学术依赖结构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从学者个人角度而言，若透过留学并以英文发表这个模式来看，无疑对于职业发展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不过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更是一条迈向成功的真理之路。可是，这条累积学术资本的

个人路径并不保证边陲国家的科学发展会有比较好得机会。

最后，对于西方社会学和本土社会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被Sztompka所化约成两种价值观的选择问题，我有一些话想说。社会学在所谓的边陲国家里面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反对的立场，这也是本土知识中的一个重要辩论。相同地，过度简化的二分法并没有办法辨认出那些批判概念的样貌，而这些批判概念其实正式随着西方社会学一起传播出来的。有一点必须记住，那就是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社会学永远是个复数。

References

- Beigel, F. (2010) "Social Sciences in Chile (1957-1973). A laboratory for an autonomous process of academia-building." Pp.183-212 in *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ructural Reality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edited by S. F. Alatas and K. Sinha-Kerkoff. New Delhi: Manohar.
- Beigel, F. (2011) "Científicos Calibanes. Las ciencias sociales latinoamericanas en la encrucijada del sistema

académico mundial". Valparaíso, IV Congreso Chileno de Sociología.

Gareau, F. (1988) "Another type of third world dependency: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2): 171-178.

Sztompka, P. (2010) "One Sociology or many?" Pp.21-28 in *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edited by S. Patel. London: SAGE.

Sztompka, P. (2011) "Another Sociological Utopi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4): 388-396.

UNESCO. (2010)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 不平等世界中的社会学

by Helga Nowotn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Chair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University of Vienna, 澳洲, ISA终身会员

20世纪充满了不平等，但是在看了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之间的辩论之后，我发现我们好像拥有更多的知识与科学资源。让我用下面3点来回答。

1. 全球科学及其不平等

由于科学的前沿研究、技术、应用等彼此交织，相当错综复杂，所以科学算是一种全球性的学科。此外科学也被许多国家的政府把它视为是经济发展、武力、国家荣誉的发展动力，所以科学成长的速度可谓前所未见。人类活动的复杂程度至此已经到达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也产生了很多在地和全球性的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已经被挑战要去反省自身的观点，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科学与人互动的处境，等等

。接着也衍生出许多重要的问题，像是STS研究中的社会与自然的共同再生产，从全球性公民身份(或许是乌托邦来关照)信息、知识、教育、民主等的不平等机会。

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科学研究资源与机构不平等分布的反面。大量的科学研究发表都来自于北方，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研究大学、机构。同时，随着STEM(科学、科技、工程、医学)所作为主要的受惠学科，以及当中国、印度、巴西快速地增加他们的参与，整个图像就起了变化。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像是气候变迁和基本教义派，对政策制订者来说，社会学仍未没落。当大家普遍认为创新不过是对未来的集体赌注，科技的创新将会需要更多的社会创新。

2. 想象的真实乌托

邦和替代性知识

和一开始的时候相比，社会学的学科过国家认同的成分已经明显的式微了。一旦一个学科被建立，其风险就是要负起责任。科学，德语中的Wissenschaft，其特征就是内部的多元与动态。新知识总是在学科的交界处产生。科学、技术、和科技在边界中很有创意地移动着。虽然传统的学科界线还是很明显，可是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已经很难阻挡了。

这里我并不是说学科疆界已经无关紧要。相对地，既有的学科认同对于学生去学习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我们都有一种体认，就是存在着所谓的“社会学核心”，而且有必要固守其免于受到新兴学科的管理与企图把社会学变得更有效率与更有责任。这并非只是单单西方世界的问题而已。商业成功模式无所

>>

不入，特别是在北美、大学、或是其他的模仿者，学科边界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

社会学相当具有生产力与破坏性，当它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坚持能动性、企图把社会带回更多元的情境时，的时候，更是特别如此。虽然社会学是在民族国家的阴影下产生的，以及问题和国家领土相关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可是从当代的观点来看，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只是多元知识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而已，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被其他的社会领域，像是经济、社会、政治脉络所形塑。

为了避免自我狭隘化，社会学应该从学科和国族边界中解放出来。借着多元化和全球化，我们仍然要去关心社会学是否会变成一种“后学科”。历史上来说，在缺乏创新的制度之下，它还是会循着这样的路径来发展：从阶层化秩序(立维坦)到开放如社会运动和网路，以及其自身对其的挑战。

3. 从学科和国族疆界将社会学解放

知识上的乌托邦必须要处理其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如何去检验知识的有效性。此外，它也要在其所批判的知识阶层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启蒙带给我们的对于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强烈反对，所以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暂时性的，唯有知识演进的真理——以及多元的真理——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

就是启蒙的思想为什么得以持续，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发展另类知识的动力。

其他方面来说，启蒙需要反省与创新(Aboagora)。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包含情感(包含道德情感)、理性、合理性的概念。这是介于沟通和自主之间以及其自身与集体多元性的概念。我们要重新考虑那个将人为和自然区别开来的二分法的不合理，也要承认普遍主义的谬误，进而拥抱全球脉络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地化(Dipesh Chakrabarty)或是“另类知识是可能的”(De Sousa Santos, 2007)呼吁要超越北方的认识论和重新建构认识论的多样性。如此的真实知识乌托邦才有可能，因为其想象结合了另类的知识，像是人性尊严，集体正义，以及期待的能力(Arjun Appadurai)。或许也因为它包含了从属者运动并且拒绝将其乌托邦拖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所以得以可能。他们必须和既存的知识生产体系交手。这是进行中的快速转变，并透由科技所提供大量的全球教育机会，打破知识的垄断，共同生产知识。可是我只有跟Royal Society (2011)一样的悲观结论：“英文仍然持续地势主宰性的研究语言，而且世界各地都在慢慢地接受并采用它了。”

References

Aboagora (2011) <http://www.aboagora.fi/>
 Allenby, Braden R. and Sarewitz, D. (2011) *The Techno-Human Con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Chakrabarty, D. (2007)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 Sousa Santos, B., ed. (2007) *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 Beyond Northern Epistemologies*. London-New York: Verso.

Nowotny, H. (2010) “Out of science – out of sync?” Pp.319-322 in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Paris: UNESCO.

Nowotny, H. (2006) “The Potential of Transdisciplinarity”, <http://www.interdisciplines.org/>

Nowotny, H., P. Scott, and M. Gibbons.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Oxford: Polity Press.

Pollock, S. (2008) “Disciplines, Areas, Postdisciplin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isbon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Bologna Process.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Royal Society (2011) *Knowledge, Networks and Nations: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yal Society. ■

> 战争结束并不等于和平

by Alice Szczepanikova,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 车臣仍饱受战火无情的摧毁

Luba Vladovskaja到她位于维也纳阴暗又寒冷的公寓中。她在躲在车臣首都Grozny的地窖和防空洞数日之后，要儿子为他找一间有大片窗户的房子。她曾经拥有过一片大窗户，不过庭院很肮脏，窗框也破掉，导致很干燥，并且让地板更佳冰冷。她

和她的儿子与先生一起住在这间两房的公寓中，之后在2008年被迫搬离车臣，最后住进奥地利的难民营里。而她的两个儿子逃走了，原因是为了避免非法的拘捕与刑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车臣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和平就此来临，欧洲的难民营也不

能保证安全无虞及免于恐惧。

俄国和车臣的战争已经开打已经17年了，而第二次战争也12年了。2002年，Putin宣布战争结束，而接下来的2年，许多俄国公民，多数是车臣人，开始到欧洲寻求庇护。奥地利接纳了最多人。俄国人

>>

仍然是欧洲难民的大宗。尽管拒绝率越来越高，他们还是不断前仆后继地前往避难。

在2000年，俄国政府有支持莫斯科的车臣政治人物，因此被称为冲突的“车臣化”。他们开始实行反恐怖主义的政策。由于莫斯科的支持，车臣人逐渐拥有更多的空间去影响政府施政。所以车臣虽然是俄国联邦的一员，但是他们确有自己的系统、制度，特别是刑法、诉讼法律，被用来掩盖刑求的证据。数百人就此被牺牲了。而地方政府也有自己一套侦察犯罪的模式。他们首先找到一些嫌疑犯，然后再去找犯罪证据将这些嫌疑犯定罪。证据都来自于刑求的口供而已，一点公信力也没有。况且法院全都是亲政府的人是所主导，这样一来这些人都能很快地升迁上去。然后所有的罪名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份子”。

Luba的儿子Mikhail Vladovskij在历经了两年牢狱之灾之后，在2005年被

无罪开释。他是以炸掉依台载满士兵的车子而被起诉的。然后和他一起被定罪的同伙，他在被拘捕那一天才第一次见到，而且也被刑求过。这是个典型的个案，不过无罪释放却非比寻常。Anna Politkovskaya和Natalia Estemirova两位人权运动者(后来都被杀害)曾经为文撰写这次法院判决的特殊性。法院最后决定要再仔细看看证据与判决。当Mikhail慢慢复原之后，就决定要逃离，躲避再次的无妄之灾。的确，检察官不服，继续上诉。在Mikhail逃走之后，Luba继续帮儿子辩护，希望可以为他被刑求讨为公道。可是从此她就厄运临头了。许多持有武器的人不断上门骚扰，而且还会被路过的车子开枪射击。于是她马上意识到：轮到我该逃跑了。在两次战火中侥幸存活下来之后，她逃了。这是车臣人民逃难的标准模式。

在Luba住进新家之后，她许多潜藏的疾病开始一一出现了。在车臣，她

根本付不起医疗费。她花了很多时间住在医院里面。但是害怕从来没有停过，因为那种害怕太深了，深到无法摆脱。现在就算听到电话铃响，她的双手还是会不断颤抖。她有理由恐惧吗？2009年，Umar Israilov，一位在奥地利难民营的车臣青年，有一天光天化日地就在维也纳的街道上被枪杀。他控诉俄国政府不当刑求，并且控告车臣总理Ramzan Kadyrov也是帮凶。Israilov这样一被枪杀后，不但目击证人减少了，也给车臣难民很大的杀鸡儆猴作用。车臣难民营内弥漫着一股不信任，并且Kadyrov的亲信和告密者遍布欧洲。凶手今年被定重罪，不过背后的指使者仍然缺乏足够证据定罪。Putin是Kadyrov的主子，正准备要重返总统大位，可预见的是车臣的悲剧不会就此停止。

> 拉美社会学大会： 关键宣言

by Raquel Sosa Elízag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SA 横滨世界大会副主席



智利学生在拉美社会学大会会场举海报抗议

第28届拉美社会学大会于2011年在巴西Recife举行，从9月6日到10日，为期5天，共有4578人参与，9716名学生、学者、专家、老师注册。University of Recife以及巴西其他大学的师生共同筹办，规划了7场主题演讲，9个整合场次，25个主题，52个圆桌，以及30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团队是个充满活

力、行动力、批判且令人喜爱的一批年轻人，提供了各种辩论主题，问题，研究成果，使得这场大会是有史以来最受到热烈回响的一届。

拉美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区域。一方面，墨西哥发生了5万人死亡的惨剧，急需司法的介入，否则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种族屠杀；海地则历经了地震大破坏

>>

，而重建速度缓不济急，人民仍然水热火热；危地马拉旧的种族屠杀者正在复苏当中；宏都拉斯的新独裁者上台统治了；古巴的经济封锁仍然荼毒着人民超过50年，毫无自由可言；国外军队至今仍驻扎在古巴、哥伦比亚、波多黎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有着人民如何建立另类制度，以彰显我们其实是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传统的：巴西、厄瓜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古巴、秘鲁等国的人民都开启了希望大门，意识到现今多个严重的问题，并讨论着拉丁美洲的未来何去何从。

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暴力每年夺走14万人的性命；超过3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而8%的人则是文盲。我们也没有让教育机会变得均等，却同时让数以千计的人连生活的基本水平都无法达到。甚者，我们也对于大学越来越专门化，使得师生躲在象牙塔内无法与外在世界接轨这样的问题束手无策。学生完全不知道政治、文化、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更遑论经济议题了。

不过也有鼓舞人心的事情。在智利这个最早引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有一股古典自由主义运动兴起捍卫公共教育的制度。乌拉圭、玻利维亚、巴西、波多黎各等国也相继响应。许多老师学生积极发声，表达他们的意见，要维护公共生活，并且从教育改革开始着手。从这里，我们重拾批判的精神，并注入现在与未来的年轻世代。因此我们也在Federal University of Recife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院（Instituto de

Pesquisas Latinoamericanas），为这的区域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这个机构由以下的人所筹组的：Ruy Mauro Marini, Octavio Ianni, Florestán Fernandes, Agustín Cueva, René Zavaleta, Eduardo Ruiz Contardo, Lucía Sala。至于其他人，我们也由衷感谢他们挺身抵抗恐怖主义、性别屠杀、种族主义、偏见、以及种族屠杀。拉丁美洲的人民面对到了各种威胁，使得他们失去尊严与生命。我们的角色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力与坚定的意志去努力建立一个由Toussaint Louverture, Hidalgo and Morelos, Bolívar, Artigas, O' Higgins and San Martín, José Martí, Benito Juárez, Sandino, Farabundo Martí, Che Guevara, Salvador Allende等人所梦想的理想社会。“Long Live Latin American Sociology! Long live ALAS!” Elízaga教授的“关键宣言”已经被委员会毫无异议的通过采用。 ■



> 骚动年代的社会学： 欧洲社会学会演讲

by Anália Torres, Universidade Técnica de Lisboa, 欧洲社会学会会长, 2009-2011



Jennifer or the Rotation of
the Flight Attendants, Carré
Rouge Cie在欧洲社会学会大会的
展示。Sandro Cattacin摄

欧洲社会学会第10届的主题是“
骚动时代”的社会关系。会议在
2011年9月7日到10日于日内瓦举行，
主题似乎很切要害。动乱的确常在
日常生活中上演，在2011年特别是如
此，

我将欧洲的经济情况称为金融战
争。20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大战和一

>>

次冷战；21世纪面临到经济与金融的战争。从金融市场和信贷公司而来的压力使我们仿佛受到军事侵略一般，影响每一个国家脆弱的经济体制，以及欧元。新自由主义几乎无孔不入，从国家到大学都被占领了。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因此兴起了各种反抗声浪和反对运动。这种种情况汇聚成一股莫名其妙的意识型态：公共资源用来帮助私人企业获利成长，结果反过头来公共支出却要为金融危机负责。

我们是怎么落到今日这般田地的？这一切的危机其实早在1980年代就可以预见端倪了。欧洲的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就一直警告这种主流政治、经济、金融思想的负面伤害。这三股趋势有时独立、有时结合、有时存在着矛盾。

第一股趋势金融和经济。全球金融主宰了各个区域、国家的政治。20年来跨国公司和廉价劳动力席卷整个欧洲，并在90年代带来了分裂的危机。金融资本的威力让政府简直对他们束手无策。经济萧条和福利国家危机就是这股潮流所造成的结果。对社会学家来说，经济剥削的毁灭性后果一点也不难想见。的确，我们正在见证这股毁灭：冲突、抗争，甚至暴力。

第二股趋势则是政治。欧盟的建立就是各种上述矛盾力量的代表。欧盟某种程度代表了要超越民族国家或是各种意识型态，建立规范，保障人权等所做出的努力。此外，欧盟也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宗教思想，而是对于二次大战与大屠杀反思的结果。然而，在建立之后，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的思想主宰了欧洲议会。公共利益等那些启发欧盟创建者的政治思想就从此不复存在。

第三股趋势在全球的层次上链接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议程。我们只有意识到反对移民政策、失业、环境污

染的政治行动，却没有发现在公民组织与跨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权力不对等。毫无意外地，社会抗争通常以很愤怒的形式出现，而非有组织有规划地行动。这提醒了我们早期工业化时代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危险阶级。

虽然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在公共政策和建立欧盟为社会模式的努力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还是不够。我们还要重新精致化我们的社会分析技巧，开拓未知的领域，并揭开金融市场运作的黑盒子。更重要的是把我们所知的结果广为大众知道，并公共化，然后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最后，我们要和世界其他人合作，像是Michael 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理念，或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的其他人士，一起为更美好的世界努力。■

> 欢送Devorah 欢迎Mohammed

Devorah Kalekin是国际社会学书评(ISRB)的创刊总编,最近她刚卸下职务,即将于2011年底交棒给Mohammed Bamyeh, 出版副会长Jennifer Platt用email恭喜她的贡献,并做了简短的访问。



Mohammed Bamyeh, ISRB的新任主编

欢送Devorah

JP: 妳要发行ISRB的理念是怎么来的呢?

DK: 这个理念是从Susan McDaniel (前任出版副会长)。她则是从美国社会学会的Contemporary Sociology那边得到灵感。那是ASA最受欢迎的期刊之一。同时International Sociology 因为只有一年四期,所以加上书评若可以增加2期,再加上可以提供较鲜为人知的信息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后来我是出版委员会的会员,于是Susan问我的意愿,我就开始着手写计划书了。

我写道:ISA的出版致力于发表文章之余,也不忘要重新点燃社会学的想象。尽管我们对于经济全球化有所质疑,可是社会学毫无疑问地要走向全球。社会过程要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历

史的角度去解释,很显然地是去结合理论与经验,可是人们的活动、商品、技术等我们早已熟悉了。这份期刊将会代表我们对于当代社会事实的重视,也会藉由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去支持各种服务,这个平台是用来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以及社会学观点,以弥补信息不易取得与不对称的困难。

整个计划先从名称开始着手。我原本希望它叫做Review of Books,因为这个名字相当庄重(gravitas)。而其他的像是书评、文章、访谈等主题则是随着每期而有所变化。这个理念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学科内部的多元性有所坚持以及想要兼容并蓄的缘故。我的理解在于我认为编辑的责任是确保刊物内容可以迥异于欧美主流学界常见的内容,并且以非英语的语言发行。文章则是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整合社会学的重要领域或潮流。原本计划是每期包含三篇文章:古典、方法、以及其他社会学次领域之一。我也很高兴可以找到理由把访问纳进来,因为这是我很喜欢读的部分。因为我认为读者读到一篇文章时会很好奇这是怎么写作出来的,所以我开创了“幕后告白”。其他的就是很仔细的评论部分,大概1500个字,以纵览的方式呈现,而非针对特殊主题去申论。

JP: 那可以请妳总结一下成果吗?

DK: 虽然至今阶段性任务都已达成了,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它提供了读者当今世界上社会学这门学问不论在方法或是内容上的多元性。此外它也提供了年轻学者的交流平台,同时让年轻与

老一辈的学者可以发表。我另外还觉得满意的一点是被评论的文章和评论都来自世界各地，甚至涵盖学术的各个阶层。某种程度上ISRB已经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有许多文章都不是用英文撰写的，因为我们接收非英文的文章。

JP：什么是妳特别想强调的呢？

DK：嗯，有蛮多点的。首先，我想谢谢所有的ISRB同仁，让每一期的内容都非常充实精彩。访谈是另一个重点。由于种种限制，我只能去问很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访谈过的每一位社会学家都拥有很独到的见解，而且这些见解是我们在阅读其文章时不会知道的。他们的观念提供了我们诠释其作品时非常让人惊艳角度。最后，ISRB同时刊登了新颖领域以及古典领域的文章。

JP：接受度为何？

DK：就现在的学术政治氛围而言，我应该要以Impact Factor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不晓得是幸运还是不幸运，Impact Factor并不是用来计算书评的。所有的文章都是邀稿，若必要的话，修改意见还是在编辑与作者间的沟通中产生。所以参考书目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看看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接受度来下判断。很多人希望ISRB对这个指标有所贡献没错，不过重要的是每一位同仁都很喜欢他，而我也相信他们是真诚的。

JP：什么地方妳觉得有最多问题？

DK：Contemporary Sociology的主编Alan Sica告诉我说每个人都喜欢阅读书评，可是却没人想要写。这正是ISRB所面临到的情况。主编所面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去邀稿。办公室固定会持续不断地有新书名单，甚至是会有出版通知。筛选这些书，挑选适合的，这部份很有趣。然后难的是去找评论者。像是ISA这种有60个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其实是不难去找到适合的人来写书评。不过阅读书评的意愿和写评论的意愿真的是两回事。很显然这问题可以被解决，只是依然有点困扰就是了。

其他的问题则和内容有关，而且我决我这部份自己没有处理得很令人满意。我原本计划是规律地去纳进各式的可视化的社会学作品。若是如此，那应该是范围和数量都有稳定成长。但是在我任内，我只有收录进少量的纪录片或是影片的内容而已。

JP：妳有什么话想对下一任主编说的吗？

DK：这些话除了告诉我之外，也提供给你参考，就是ISRB的创刊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不过我没有胆怯！我觉得很荣幸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并希望Mohammed Bamyeh可以做得更成功！

欢迎Mohammed

Mohammed Bamyeh是ISRB的新主编，同时也是美国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社会学教授。他长年将心力放在伊斯兰议题的研究和教学上，此外也专精于政治社会学、比较研究和政治理论。更多的细节请至：www.sociology.pitt.edu/faculty/index.php?q=mohammed-bamyeh/view。

他非常期待可以延续Devorah Kalekin的脚步，并继续茁壮ISRB的独特精神。他希望可以邀请大家针对较为罕见的社会学领域投稿。并欢迎非英语的文稿件或是国际间不易取得的讯息。联络方式：mab205@pitt.edu ■